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教授訪談記錄

口述者：黃克武所長

訪問者：丘文豪、劉得佑

記錄者：劉得佑、薛書耘

黃克武教授為本系傑出系友，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於本系研究所開設中國思想史專題研究、近代中國思想變遷專題研究；在台灣大學則教授二十世紀中國史專題研究等課程。黃教授的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翻譯史、文化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並出版多本中英文專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等；以及論文七十餘篇，研究成果豐碩。

做為一位傑出的歷史學者，黃克武教授是如何踏上這條道路的，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黃教授的學思歷程。透過面對面訪談，《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對克武教授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以下是這次訪談的內容紀要，提供給有意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學弟妹們一些思考的方向。

（對談雙方，《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稱「報」，克武教授稱「黃」。）

報：只要有選修過老師課程的同學，大都對老師敏捷、清晰的思辨能力印象深刻，都覺得老師大可以往政治或是經濟等學科發展，因此對於老師選擇歷史系感到好奇。想請教老師當初為何會選擇走上學習歷史這條道路呢？

黃：我在板橋出生與成長，父親從我小時候開始，暑假時總是要求我做兩件事情：練習書法、背誦《古文觀止》與《唐詩三百首》。家父雖然是軍人，但卻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認為讀書是唯一的正途，人應該走的方向就是具備人文素養，且透過教育來成就自己。這是因為家父曾經歷中國最動盪的年代，年輕時沒機會讀書，來到台灣以後，便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機會可以好好讀書，這種觀念也影響了我。

我從小喜愛閱讀，將閱讀視為一種樂趣。小時候看過許多武俠小說，我認為武俠小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人文與想像的世界，這的確是影響我走上歷史研究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我也看了不少漫畫（我就讀的板橋國小旁有幾家書店，我

常去店裡面站著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史記·刺客列傳》為素材的漫畫，讓我開始憧憬太史公所描繪的情義世界。進入海山國中後，我特別喜歡國文課，喜歡寫作文，而且總是和同學比賽背誦唐詩、宋詞等。簡單地說，從小我就喜歡接觸與「人」相關的東西、思索人性的複雜性，而且在成長的歷程中，我一直對於文科比較感興趣，後來會選擇讀歷史，應該與此有關。

但真正走上學習歷史的道路，其中最關鍵的轉折發生於高中時期。我的高中生涯是在師大附中度過的，班上人才輩出，周陽山、高朗、郭承天等都是 288 班的同班同學。當時我除了受到高中歷史老師向玉梅的啟發之外，也受到南陽街歷史補教名師的影響。我在附中的成績其實不需要補習，之所以前往補習班，是因為姊姊在台大補習班準備考試。姊姊覺得歷史老師授課相當有趣，所以在她的推薦下，我就跟著一起去旁聽。

當時在台大補習班教授中國史的老師是林忠勝，西洋史則由王武聖老師（到師大之後才知道他就是教美國史的王文賢老師）負責，兩位老師的講課都相當精采，尤其是林忠勝老師。林忠勝老師在講授課程時的繪聲繪影，讓歷史故事顯得生動無比、精彩萬分；但在分析史事時，林老師也有其獨特見解。我之所以會進入歷史學的領域和林忠勝老師的關係最為密切。林老師後來秉持教育理想，返鄉辦學。有一年近史所去慧燈中學參訪，由他主持座談會，會中我曾談起他對我的影響，讓他覺得很開心。後來每年，直到他過世，我會寄一張賀卡給他；他也將他所做的口述歷史叢書寄給我。梁啟超喜歡講佛經中的一句話－「緣起不滅」，或許從那個時刻開始，歷史的種子就已經在我心中種下，這是我選擇歷史的緣起。林忠勝老師讓我覺得歷史是有趣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一門「知人論事」的深刻的學問。

當時師範大學和師大附中之間有從屬關係，附中可以保送每班級的第一名學生直升師大。當時我三年平均成績是全班第一名，符合保送的條件。雖然同學們都認為我有機會考入台大，但考量到家裡經濟狀況，最後還是選擇了師大。當時附中保送師大的人多半都會選擇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的名次在歷史系之前，我卻與眾不同，我覺得語言是一種工具，對我來說，歷史是最寬廣的一門學問，所以最後選擇了歷史系。

報：想請問老師在師大歷史系讀書時，對於哪些課程或是老師印象特別深刻？

黃：1975 年 9 月我進入師大讀書的時候，現在的師大路還叫做龍泉街，有很多小吃店。我們每月可領公費 790 元，每餐自助餐約十元。當時師大老一輩的老師

幾乎都還在，如朱雲影、高亞偉、朱際鎰、沈明璋、曾祥和老師等等。而現在師大的老師在當時幾乎都是講師或助教，比如說吳文星、溫振華、林麗月、朱鴻、鄭瑞明老師等等。當時師大歷史系的氣氛很好，尤其是這些年輕的老師與助教跟學生之間的關係十分融洽。

剛入學的時候，我對台灣史很感興趣，因此和溫振華老師有許多互動，我第一篇學術論文〈清時板橋的開發與寺廟〉(1978)就是在溫老師的協助之下寫成。我參考了很多文獻，也做了田野調查。當時學生們對林衡道老師也相當著迷，我參加了好幾屆他所主辦的台灣史蹟研習營，前往台灣各地進行史蹟考察。(後來我進入近史所與此一經驗有關，因為呂實強老師去授課，看到我的表現，很欣賞我，1985年我師大碩士班畢業之後，才有機會進入中研院) 1977年，台灣史開始盛行，王啟宗老師首度在師大開設台灣史課程，王老師因為留學日本的關係，上課時總是西裝筆挺，神采奕奕。這門課原本是給大三、大四的同學選修，不過我和王良行(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很感興趣，在王老師同意下選修了這門課程，於是就和王啟宗老師到處做史蹟考查，因而跑遍台灣許多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淡水、萬華、新竹、台南等地。

當時除了修習王老師的台灣史之外，還有修習邱添生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廖隆盛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王家儉老師的明清史，以及李國祁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和陸寶千老師的中國思想史。邱添生老師跟王啟宗老師一樣曾經留學日本，所以上課時西裝筆挺，內容紮實。一上課就寫板書，而且總能在不看稿子的情況下默寫出完整的史料！至於廖隆盛老師，上課非常風趣，侃侃道來，引人入勝。王家儉老師當時是系主任，對學生非常好。他最近將他寫的回憶錄《夢影萍蹤》寄給我，書中談了不少當年的往事。老師之中最嚴格的當屬李國祁老師，李老師曾留學德國，是一位嚴格到會讓人做惡夢的老師。他非常有學問，課程內容豐富、紮實，使用很多材料進行講解，我們總是埋頭寫筆記，還跟學長學姊(訪談中有提及陳惠芬老師)、學弟妹一起編纂共同筆記。我曾多次向李老師請益，他給我的兩個建議我一直銘記於心：一是「勁氣內斂」；一是凡事要做好準備，「買好火車票，等火車來」。

陸寶千老師的課也讓我對思想史產生濃厚的興趣。陸老師熟悉經典，文字典雅，教材內容很豐富。後來我在師大上的課就是接替陸老師，教授中國思想史。陸老師看似老派，其實思想新穎活潑，偶有妙論。他喜歡說「人生有三大不幸：聰明、多情、胸懷大志」，要我們引以為誡。

西洋史方面有曾祥和老師(沈剛伯夫人，今年剛過世)、高亞偉老師、王文賢老師、黃小平老師等。黃小平老師教大一世界通史，要讀原文書，上課時要我

們當場翻譯，深感壓力；後來她又開了「心理史學」的課，我寫了一篇〈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個心理的分析〉的報告，後來登在《食貨月刊》（1980）之上。

在大學時期影響我最深的課程是朱際鎰老師的中國文化史。朱際鎰老師風采翩翩，上課有時穿西裝，但更多的時候是著長袍、戴著一頂帽子、披白色圍巾。中國文化史的指定讀物是錢穆與柳詒徵的著作，這些讀物奠定了我的史學基礎，當時讀的是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錢穆的《文化學大義》、《中國文化史導論》、《國史大綱》等著作。所以可以說，帶領我們走入錢穆與柳詒徵世界的，就是朱際鎰老師。錢穆所說，對中國文化抱持著溫情與敬意，從朱際鎰老師身上就可以看見那種風采。

當時師大的學風雖然相對保守，但也比較樸實，對中國文化持肯定態度；相較之下，台大的學風則瀟灑著反傳統的氣氛。當時除了讀老師指定的書籍之外，同時也讀魯迅、李敖、以及胡適的著作。魯迅的作品在那個年代還是禁書，大家傳看《阿 Q 正傳》的時候，還使教官非常生氣。但我覺得當時我內心充滿著兩股力量，一方面是錢穆和柳詒徵；另一方面是魯迅、李敖。

大學除了修習課程之外，亦曾參加過「人文學社」、「噴泉詩社」的活動。人文學社是一個有悠久歷史人文性的社團，由吳自甦、牟宗三等先生發起，主要由文學院的學生組成，也有出版雜誌，後來我接替陳惠芬老師擔任社長。我們還編了一個刊物，叫做《人文復刊號》，第一期（1977 年出版）中主要的文章是由我與王明珂（現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王良行等人所寫的。詩社也很有趣，舉辦了很多新詩朗誦的活動，當時很著迷的幾首詩是王祿松的〈狂飆的年代〉和鄭愁予的作品。

報：老師就讀師大的時候，應該還是屬於公費時期，畢業生一般都是從事歷史教學的工作，不過後來老師卻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想請問老師在教學與學術研究之間，是如何進行抉擇的？又是如何走上思想史研究的道路的？

黃：實習的時候，我和王明珂教授都被分發到板橋的重慶國中，當時一邊教學一邊準備考研究所，之所以會考研究所或許還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挺順理成章的。不過，其中也包含我對歷史的一種執著，因為我認為這是值得去追求的學問，所以選擇繼續深造，後來也順利考上師大研究所碩士班。

考上之後我並沒有去讀，而是選擇了先當兵。當兵的兩年間讀了不少的書，而且在台中水湳機場服務時，有機會認識東海大學的高承恕、蔡英文、林載爵等

老師，以及張維安、翟本瑞、苑舉正、顏建發等好友，參加「科際整合討論會」，一起讀韋伯與布勞岱和西洋史等方面的書，開拓了我知識的視野。高承恕先生也成為我最敬愛的一位老師。他今年退休，弟子們幫他編了一本《青春作伴綠苑春濃》的集子，說高老師「將生命中最精華的時光都給了學生」。1983年退伍之後，我進入師大史研所。研究所的課程很多元，當時在所上開課的有張朋園老師、張玉法老師、李國祁老師、王業鍵老師等，汪榮祖老師則在師大擔任客座教授。此外還去台大聽了劉翠溶老師、錢新祖老師的課。在大學時代，接觸中國傳統的東西比較多；而到了研究所裡，才開始接觸較多的西方學術研究。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李國祁老師留學德國，他們都非常注意西方的學術傳統。台大的黃俊傑老師也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時他的史學方法課程很受歡迎。

但就讀研究所期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遇到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墨子刻教授應李國祁老師之邀來師大客座，他是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的學生。墨子刻教授的父親是哲學家 Arnold Metzger，他本人非常喜歡哲學與社會科學，受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貝拉(Robert N. Bellah)等人的影響。由於帕森斯繼承了韋伯(Max Weber)的學術脈絡，墨子刻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博士論文以清代官僚體系為中心，與此不無關係。我的英文名字 Max 也是因為對韋伯的崇敬。

當時墨子刻先生在師大講授兩門課程，其一是先秦政治思想史，談儒、道、墨、法幾家的思想；其二是明清制度史，討論明清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其中特別關注大陸學者所討論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而嘗試提出不同的詮釋。墨子刻先生帶來的是從費正清、史華慈、楊聯陞、劉廣京等人所結合起來的美國漢學傳統。後來我能夠走上思想史研究的道路，與墨子刻教授的關係最密切。

報：就讀研究所期間，老師曾經在牛津大學、史丹福大學深造，在訪談的最後想請老師就這些經驗，給予師大歷史系以及學弟妹一些建議與期許。

黃：牛津大學充滿古典氣氛，學風非常自由。採取導師制，一對一教學，當時我跟隨伊懋可(Mark Elvin)和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兩位教授讀書，也和 James McMullen 教授讀日文文獻。這是一種依據個人量身訂做的奢侈教育方式。

進入史丹佛大學，是我人生收穫最多的階段。當時曾跟隨丁愛博(Albert E. Dien)、康無為(Harold Kahn)、以及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老師學習。還記得其中一門研究生的專題討論(seminar)——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的課程，由艾文賀老師

(Philip J. Ivanhoe)教授，課程以《明儒學案》為教材，並要求學生把學案的文字翻譯成英文。如此一來，必須「求甚解」，完全掌握其意義，才能夠翻譯。我的博士論文則主要由墨子刻與康無為老師指導。

美國的制度與英國不同，美國大學的制度非常有效，把學生每年應該完成的事項規定得相當明白。史丹佛大學歷史系中國史課程的目的之一在於培養在美國大學中教授東亞史的人才，因此學校課程的設計都朝這個目標前進。我剛到史丹佛大學時，被要求學習日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在語文以外，歷史專業的課程，大學也循序漸進地安排。由於我未曾在美國修習基礎課程，所以必須從大學部的日本史課程開始修習，當時在史丹佛大學教授日本史的學者也都是一時之選（如 Peter Duss, Jeffery Mass, James Ketelaar 等教授）。除此之外，也設計許多與教學有關的課程。教學是很複雜的活動，需要很多技巧。這些課程就是教導學生如何使用這些技巧，包括老師如何演示；跟學生互動時，要使用哪些關鍵詞、提出何種問題等等。某些課程，老師會用攝影機拍下每位同學的表現，並且透過影片進行檢討。

相較之下，英國就太自由了，就學問的根基與知識面的廣博來說，美國的訓練紮實許多。史丹佛大學課程設計了一套標準程序，只要按部就班、經過各階段的訓練，學生的品質有一定的保證。

我想史丹佛大學的這種課程設計是可以採借、學習的，教學目標一定要明確，然後根據目標，設計一系列課程，讓依照各階段修習這些課程的學生，在受過訓練之後，具備預期所要擁有的能力。以目前的師大歷史系來說，應用史學的部分就很不錯。以往師大畢業之後幾乎都是從事教職，但是現在出現了更多的可能，例如進入文化界、出版界、或新聞界等。

除此之外，英文能力與中英文寫作都是需要繼續加強的。透過英文可以認識更開闊的世界，若受限於英文能力、必須放棄某些讀物是十分遺憾的。其次，訓練寫作也十分重要。寫得流暢通順是基本的，而寫作的關鍵，在於將讀者放在首要的考量位置，必須謹記寫作的目的：在何種情況之下、為何種讀者寫作。寫作要符合讀者的期待。我的課程中一定讓學生寫作，因為我希望能夠盡量培養學生基本的規範，畢竟歷史學最後還是落實在文字之中。